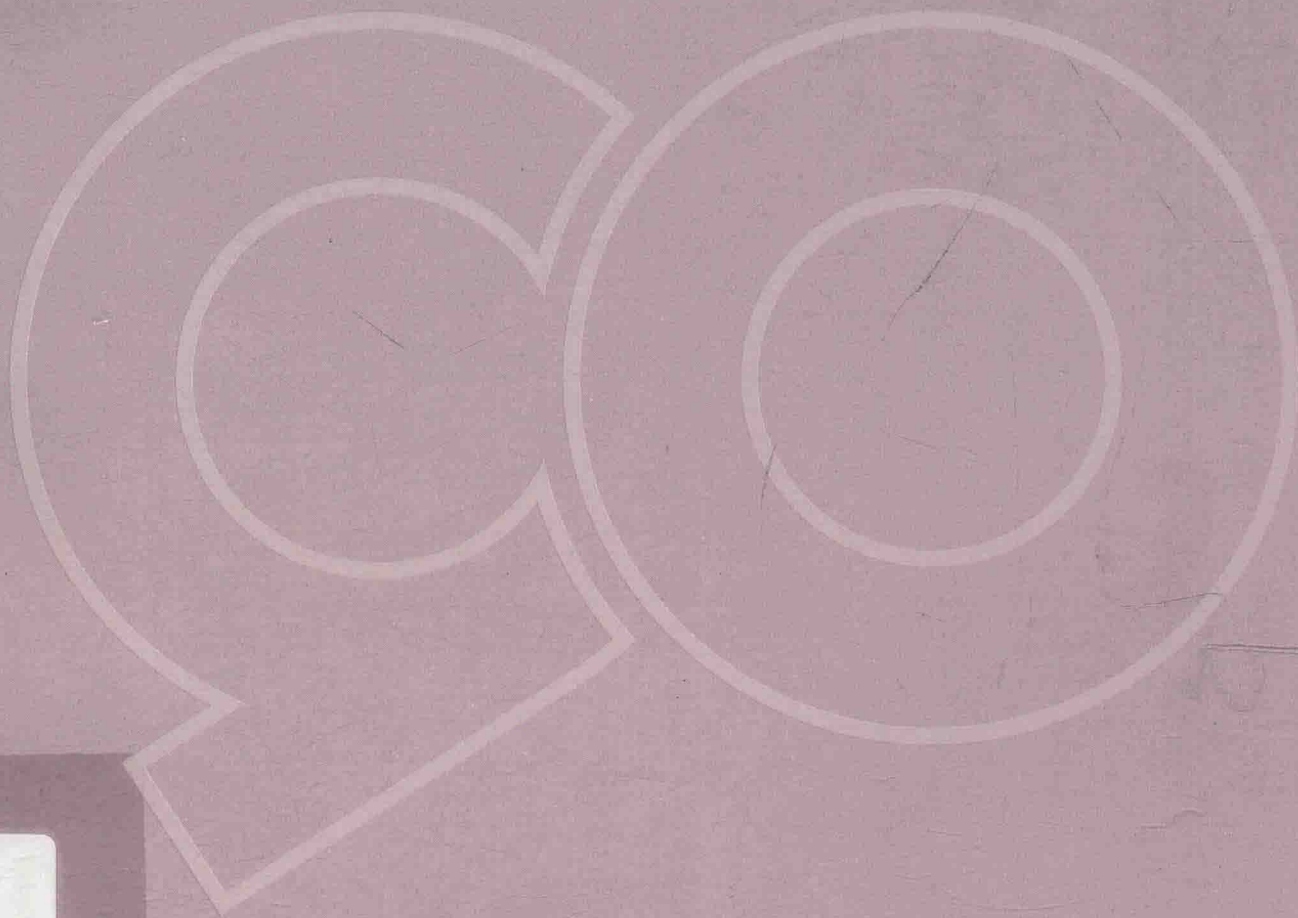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90周年院庆系列丛书
Book Series for the 90th Anniversary of
School of Architecture, Southeast University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师访谈录
The Words:
Interviews with the Teachers
at the School of Architecture of SEU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师访谈录编写组 编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90周年院庆系列丛书
Book Series for the 90th Anniversary of
School of Architecture, Southeast University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师访谈录

The Words: Interviews with the Teachers at the School of Architecture of SEU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
教师访谈录编写组 编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师访谈录 /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师访谈录编写组编.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7.11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 90 周年院庆系列丛书)
ISBN 978-7-112-21360-3

I. ①东… II. ①东… III. ①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师—访问记 IV. ①K82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50364 号

本书收录了东南大学建筑学院部分老教师的访谈文稿, 是学院发展各阶段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对东南建筑学派90年发展历程客观且生动的记录和展现, 亦为《东南大学建筑学科发展史料汇编1927—2017》的有益补充。

责任编辑: 陈 桦 王 惠
责任校对: 芦欣甜 姜小莲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 90 周年院庆系列丛书

Book Series for the 90th Anniversary of School of Architecture, Southeast University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师访谈录

The Words: Interviews with the Teachers at the School of Architecture of SEU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师访谈录编写组 编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三里河路 9 号)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北京嘉泰利德公司制版

北京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0×1230 毫米 1/16 印张: 19 字数: 401 千字

2017 年 10 月第一版 2017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79.00 元

ISBN 978-7-112-21360-3

(31075)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的前身是中央大学、南京工学院和东南大学建筑系。2003年，在原建筑系的基础上组建“建筑学院”。其是中国大学建筑教育中最早的一例，自1927年建系以来已走过90年历程。90年筚路蓝缕、成长壮大、传承创新，为国家培养了包括院士、大师、总师、院长等在内的大批杰出人才，贡献了大量重要的学术成果和设计创作成果，成为中国一流的建筑类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设计创作的基地，并在国际建筑类学科具有重要影响力。值此90周年院庆之际，编辑出版《东南大学建筑学院90周年院庆系列丛书》，一为温故90年奋斗历程，缅怀前辈建业之伟；二为重温师生情怀和同窗之谊，并向历届师生校友汇报学院发展状况；三为答谢社会各界长期以来对东南大学建筑学院的关爱和支持。

这套丛书包括《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学科发展史料汇编1927-2017》、《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师访谈录》、《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师设计作品选1997-2017》、《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师遗产保护作品选1927-2017》、《绿色建筑设计教程》、《建筑·运算·应用：教学与研究I》等共计6册。其中《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学科发展史料汇编1927-2017》完整展现了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各学科自1927年建系至今的发展历程，整理收录期间的部分档案资料，本书亦可作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建筑教育源流及发展的参考资料；《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师访谈录》收录了部分老教师的访谈文稿，是学院发展各阶段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对东南建筑学派90年发展历程生动且真切的记录和展现；《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师设计作品选1997-2017》汇集了近二十年来建筑学院在任教师的规划、设计作品共计99项，集中反映了东南大学教师实践创作的成果、价值与贡献；《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师遗产保护作品选1927-2017》依实践中涉及的建筑遗产保护五大类型，选有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90余年完成的保护项目共65例；《绿色建筑设计教程》是近年来学院在建筑学前沿方向教改研究的成果之一，体现了在面对全球气候变化和能源环境危机时建筑学教育的思考与行动；《建筑·运算·应用：教学与研究I》着眼于计算机编程算法，在生成设计、数控建造和物理互动设计等方向，定义、协调或构建与城市设计、建筑设计、建造体系相关的各种技术探索，结合教学激发多样设计潜能。

期待这套丛书能成为与诸位方家分享经验的桥梁，也是激励在校师生不忘初心，继续努力前行的新起点。

编者识

序

就办学而言，教师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

据不完全统计，东南大学建筑学院自1927年成立建筑科/系至今，有近500人次的教职员曾在此度过值得记忆的年华，倾注了他们宝贵的乃至是毕生的心血。作为亲历者、见证人，他们对东南大学建筑学院诸学科从无到有、逐步壮大的发展历程有着无可争议的发言权。如果把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喻为学术的殿堂，代代为此付出辛劳和智慧的老教师们即为当之无愧的功臣；把东南大学建筑学科视为矗立的山峰，他们是无可置疑的脊梁；把东南大学的中大院比作一个数代同堂的大家庭，他们是深受爱戴的尊长。

老教师访谈是学院文化传承的重要环节，几年前出于对学院及其学术传统的认知意识，有了这项工作的起始。作为院庆90周年系列丛书的重要组成，此次我们整理了其中部分老师的访谈资料，并编印这本《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师访谈录》。希望能为众校友和业界同仁提供另一组视角独特多元、感受至真至切的学院发展的鲜活画卷。

编者

2017年9月

目 录

1	钟训正	142	潘谷西 杜顺宝 陈 薇
5	齐 康	165	潘谷西
15	朱敬业	184	刘叙杰
20	徐敦源	203	刘先觉
25	高民权	216	朱光亚
30	杨文俊	250	郭湖生 张十庆
32	鲍家声		
42	杨永龄	259	沈佩瑜
48	贺镇东	260	方善镐
64	钱祖仁 龚蓉芬	263	甄开源
68	黎志涛	270	柳孝图 方 华
77	仲德崑	273	唐厚炽
87	黄伟康 鲍家声 单 踊 丁沃沃	277	姚自君
	郑 炘 顾大庆 赵 辰 龚 恺	285	庄金元
	张 雷 吉国华	287	薛永骧
96	黄伟康	292	高祥生
101	吴明伟		
			后 记
109	沈国尧		
112	刘先觉 邓思怜		
123	杜顺宝		



钟训正

被访者：钟训正（1928年生，1952年南京工学院建筑系毕业，1954年调入南京工学院建筑系，中国工程院院士）

访谈者：顾大庆、单 踊、汪妍泽、刘学超

时 间：2013年5月1日，14:30-17:00

地 点：钟训正老师住处

入学

我1948年进校时正值南京解放时期，在学校只上了一两个月的课就被疏散回去，等于是休学了。原本我和戴复东是一届的，他家在上海，一解放就回来了，而我们家那边解放得比较晚。1948年进校时，我就比别人晚了一个多月，后来又休学耽误了一年。1949年，我回学校时已经是11月份了。

在校学习

进校后，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投影几何，那时是和土木系、机械系等一起在丁家桥上的课，教材是英文的，那个书写得很简明。但因为我进校比较晚，错过了一些课程，开始学得很艰难。那门课程是讲课一个小时，当堂画两个小时，作业当时就交，没有交的就是零分。建筑系比较特殊，一个学期就将投影几何学完了，别的系都规定是两个学期。

素描课是杨老教的，也在丁家桥上。另外还有一个助教巫敬桓，他手头功夫也很好，他会带一些兽吻过来让我们画。当时我们对于杨老布置的任务很不上心，四小时的任务我们只花一个小时就完成了。杨老是很严格的，他看到我们的表现很生气，“你们要是在这么下去就不要读建筑学了”，还说一定要把课上的时间用足。画素描用的是软铅笔画。

还有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设计初步，多立克柱头的渲染相当难画，方形和圆鼓形的交接很难掌握。那时，我们很不耐心，画得很不细致。这是在四牌楼上的。渲染之前还有过仿宋字、方块渲染、柱头渲染等基础练习。一年级上学期都是基础练习。

首先是测绘图书馆侧门画墨线图，这个和第一年相同，只是我第二年进校时已经错过了。然后是墨线字体练习，包括仿宋字、罗马字，竖排版，图幅比A3还要大。渲染先是方块、柱式渲染（法国退晕）练习，然后是多立克柱头。当时只有两个人及格，61、62分的样子。这就是第一学期的学习内容，大约20周，杨老、巫敬桓为主，童老也会来看看。

西古构是在大背景中将一些内容抽出来，画柱头到柱础的放大图。参考的原图中有一些希腊文的花纹，我原本想省略，受到了杨老很严格的批评。好在及时改正过来，大家的学习风气也渐渐转好，杨老很高兴，向童老、徐中、刘光华表扬了我们，那次我们作业的得分都很高，我的得了95分。古典柱式的资料我们都是参考蓝皮书，将书

上的范例按比例放大，再根据一些作图原理绘制到图板上。其实西古构也是先收集资料做好全景构图，再将其中的细部放大放在前景位置。首先要画草图，给老师修改，反复几次才能定稿。蓝皮书中“鲍扎”体系的图都画得很精细，印刷效果也很好。

一年级下学期就开始做设计了，公园桥、茶亭、小车站，最后一个灯塔，第一个设计公园桥，要求是西方古典的，后面的设计不限制是中古或是西古，也可以做现代风格的。每个作业时间不长，车站是快图，其他作业大概4~5星期。主要是杨老和巫敬桓教，公园桥是杨老教的，最后一个灯塔是徐中先生教的。童老是一下开始教的，没有带过我。做公园桥的时候，杨老要求能够将古典形式应用于设计中，这个作业我也被批评了。还有一个就是柱式渲染了。但我毕业的时候先是分配到湖南，后来到武汉，还是杨老出面到教育部见到部长杨秀峰，当时下文到武汉大学水利学院要求把我调回来，反复了两次。因为当时跨区调任是不允许的，我是在中南区，开始是要调我去华南工学院的。8个人中3个人调去湖南大学，这是因为柳士英等留日的老师想成立建筑学，但是后来教育部没有批准。我在那边教的是建筑学，属于土木系的，后来变成建筑专修科，就是胡伯骞、唐厚焜一班，两年毕业后分配到东大来。我在武汉的时候，恰逢要建立武汉大学水利学院、华中工学院，华中工学院后来建成了，我在那里设计了一栋建筑，算是我的处女作了。

二、三年级作业我记不太清了，那时刘先生、童先生都来教了，当时国家刚解放急需建设人才，所以我们提前一年毕业，毕业时也没有毕业设计一说。后来我们做的设计都不做古典的了，古典装饰比较繁琐，都做成现代风格的。资料都来源于系里的杂志。我们都是用打字纸钢笔抄图，当时学习风气也是如此，同学们课下有空的时候就抄图。当时杂志种类很多，有 *PA*、*Record*、*Review*、*Architecture Design* (AD) 以及一些苏联的杂志，都可以借。开始也不管好和不好的设计都抄下来，后来慢慢看多了就有所取舍了。抄图的风气应该是从前面延续下来的，因为我们日常生活中接触不到什么好作品，即使是上海人在上海看到的也是很有限的，所以我们只有从各式各样的书籍、杂志中获取资料，我们都尽量多写多抄。我当时抄的图完成后就装在一起，现在大多都丢掉了。那时对大师没有概念，只是看着觉得好的就抄下来，审美能力是这样慢慢形成的。杨老、刘老也并没有推荐什么建筑，我们只知道杨老喜欢规矩的、可实现的建筑，对于我们抄的一些花哨的建筑并不是很赞同。对于柯布西耶等现代主义建筑大师，我们是在建筑史课上才知道的，平时看书也有一些了解，最感兴趣的还是赖特。中建史、西建史都是刘先生讲授的，他的板书很漂亮、很有条理，图和标注都画在黑板上，这也方便我们做笔记。我们平时也会组织去参观杨老在南京的一些建成作品。他平时上课也会说一些自己的设计，印象最深的是他做的专题讲座，讲解和平宾馆（1951设计，1953建成，北京）的设计思路，包括交通组织、景观营造以及当时的多方案比较，我们也很希望杨老多讲讲这些内容。那时还没有公私合营，杨老业余还在基泰，事务所里还有巫敬桓。南京的一些作品他也讲过，但是没有这么详细了。童老思维比较跳跃，想到哪讲到哪，改图都是从大体上改改。杨老改图比较细致，他教灯塔的时候，杨老画的铅笔图像渲染图一样，包括配景都画上了。我当时倒是不希望老师改图特别仔细，希望能够自己发挥。那时老师们还有自己的事务所，杨老有，童老也有，但是实践活动都不是很多了。

当时我们的设计都不做古典风格的，除了基本训练里有古典的，其他基本没有了。

主要是古典的建筑各方面都比较完善，作为基础训练比较合适，而现代建筑还有很多方面还不成熟。童老改图是不怎么动笔，渲染的时候会动笔大体画画。童老自己画图是很快的，他当时做过省政府大楼、大桥桥堡等等。

我们从初步设计开始都是做一个简单的单体，处理建筑和环境的关系，组织里面的空间，就这样慢慢从小到大、从里到外地训练。一、二年级我们都是做小建筑，积累小的知识点慢慢扩大。关于巴黎美院第一次草图不能修改的传统，我们是这样，最后评图的时候会要求把以前上交的草图拿出来看，如果出入太大就会扣分。但我们不是很在意，最后的结果与开始不同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开始如果是错误的还一再坚持，我感觉是没有必要的，应该是逐步推进、逐渐完善。开始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做出的方案和经过学习产生的方案肯定是有所不同的，所以我不是很在意这个。评图是老师关门评分，评完了我们自己去看，当时也不会去问高分低分的原因，分数相对是比较合理的。我们当时在大平房，高年级在门口，低年级每天经过就看看高年级在做什么，慢慢地有所熏陶，这个是很合理的。我在校的时候在校总人数才二三十人，各个年级交流非常频繁，某个年级交图时，其他年级的同学会过去帮忙。过年过节的时候，各年级还会经常一起聚餐。后来到中山院以后，各年级分开了，这个传统也就没有了。

我们在上学期间都在教室里做设计，并没有实践环节。实践不应该是学生实践，而应该是老师的实践去影响学生，所以我觉得学生去实践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办法，成功的案例很少。学生去实践也并没有机会去经历一个完整的项目，再者我们那时国家经济也不是很好，所以不必要将时间浪费在实践上。

留系任教

关于生产劳动相结合，1959年十大工程、南京四大博物馆、长江大桥、雨花台都是我当老师带学生做的。1954年，我开始是当三年级助教，设计初步我没有教过，开始教郑光复一班（56届），后来到杨德安一班（57届，刘叙杰是1949年进校，后来病休和杨德安一班），就不是助教了，正式带几个学生。助教是不分组的，帮忙组织、收图等等，也要一个一个看图。三年级童老、杨老、刘光华几位都在。我当时没有试做过，后来才有试做这个方法。

中古构在我一年级的时候是没有的，1953年，那时我离开学校了，批判崇洋媚外、学习苏联也宣扬“民族形式、社会主义内容”，开始了中古构。1952年以前可能也有了，孙钟阳一班已经有了，按照西方构图，将建筑的檐口、柱础细部拿出来画。到了歇山一角就是统一样式的了。

制图课编教材是孙钟阳、王文卿主导的，我编了开头和结尾部分。我们当时综合了英美的一些资料。我们读书的时候投影几何是与其他系一起上的，阴影透视是自己上的。后来我们将两者统一编写成《建筑制图》。我们有一些是参考 *Graphic Standard*，当时编写的时间也很少。苏联阴影透视很复杂，同济也出了一本很厚的教材，也是过于复杂、不实用。徐中先生教阴影透视，之后是龙先生，程丽也教过，后来是王文卿教。徐中教得比较实用，而龙先生、程丽教的内容比较复杂。我们的教材对于建筑系来说实用性很强，教材编写“文革”前就开始了，最早是工农兵学员在用，你们刚拿到的时候是蓝图本，还没有印刷，但是格式都很清楚。

1958年提倡“走向社会”、“理论联系实际”，学校都停课了，低年级（卫兆骥班，1958级）是“小设计院”，高年级是“大设计院”。贺镇东他们那届成立了“中设计院”，我是带“中设计院”。这个持续了几年时间，教学很不正常。鲍家声班是做南京四大博物馆，刘光华先生是他们的指导教师。我带贺镇东他们去参加北京车站设计，也有其他年级的参与。“小设计院”可以做一些小品类的小建筑，连基础课都没有。那时就是把工程拿回学校来做，没有出去做的，除了大桥桥堡设计贺镇东班参与了一些，其他学生参与的项目都没有建成的。太湖建筑工作者之家（1959年）、曙光电影院也是在同一时期，这个项目全部是老师参与的，不同于学生没有建成的项目。那时也没有什么解决老百姓生活问题的工程，都是一些纪念性的大工程。所以说“联系实际”事实上并不实际。

我在校这班还没有开始学苏联，到黄伟康他们就开始了。那时我还在武汉，所以对这些印象不是很深。不过学苏联只是在教学计划、教学文件管理、教研组等方面有一些调整，而对设计教学的影响不是很大。形式上有一些变动，比如西古构变成中古构，实际内容变化不大。

1953年以后，有一些联系中国古典民居形式做设计的（项秉仁），应用坡顶、山墙等。但是学生还是看欧美杂志为主，这也是苏联杂志所不能比的。几位先生对苏联的影响也多少有一些抵触的。

“正阳卿”这个说法是1984年我从美国回来后才渐渐产生的。我们的合作也是自“文革”后这段时间开始的。之前我们只合作做过丁山宾馆，这也是我们合作的开始。方案阶段我们合作完成，施工图阶段孙钟阳把关，他的工程概念很清楚，善于解决技术问题。大桥饭店是贺镇东、陈湘他们做的，太湖饭店更晚一些，很多人参与过。

“文革”前，贺镇东就留校跟随郑光复带设计初步，后来孙钟阳、王文卿、陈励先、陈湘等带着蒋桂全、朱坚带一年级。我毕业后离开学校两年，教学和工程兼顾。

“文革”前，各学校之间交流很少，和现在不同，并没有学术圈的概念。交流主要还是从“文革”以后开始的。“文革”前，各个学校的风格很明显，同济比较开放，清华也有自身的一套理论，到现在各学校的特色就不是很明显了。天津大学建筑系和我们风格相似，主要领导者刘福泰、徐中都是从我们这边过去的，徐中的影响力后来相对大一些。

“文革”前，做设计的机会很多，有北京站、长江大桥、雨花台，但是还是“文革”后的建成作品比较多。

我做学生时比较喜欢画画、抄图，但没有给杨老他们看过，他们也没有给予什么意见。我在武汉大学的时候经常画画，在那边我用“Kautsky”的方法画中国传统建筑大家都觉得很好，1954年暑假我来这边，也给杨老看了我的图。1954年11月，我调回这边，又画了一些给杨老看，他不以为然，他觉得年轻人不应该只攻一家，这样是不可能超越别人的多年积累的，应该多风格探索，不要急于建立自己的风格，最后会水到渠成。这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就放弃6B铅笔换成2B铅笔画了一些东西，后来觉得这个也是可以发展下去的。但是以前画的也作为基础，用起来也得心应手。后来我比较欣赏的是OTTO R. EGGERS（奥托·埃格斯，美国教师），他对质感、空间的表达很细致。



齐 康

访谈一

被访者：齐 康（1931年生，1952年南京工学院建筑系毕业留校，中国科学院院士）

访谈者：顾大庆、汪妍泽、刘学超

时 间：2013年5月3号，9:30-12:00

地 点：东南大学逸夫建筑馆五楼

入学

我是1949年入学，1952年毕业（提前一年毕业），与戴复东同年毕业。

当时系里的老师有杨廷宝、童寯、刘敦桢、刘光华、张致中、徐中、巫敬桓、龙希玉、李汝骅、樊明体、张镛森以及黄兰谷。当时学院在学校的平房里面。辅导我的是巫敬桓和黄兰谷。

杨、童、刘

我们学校是从1927年开始的，估计是全国最早的建筑学院吧，当时学校从苏州工专并过来，刘敦桢先生一起过来，兼任学院院长。解放时第一任系主任由杨廷宝先生担任。杨老师自比小毛驴。杨老一直在事务所工作，没什么兴趣管理学院的事情。至于童寯先生，童老和杨老是世交，感情很好。1982年杨老病倒后，在工人医院抢救，童老去看，长时间握着杨老的手，有诀别的意思。杨老病故后，童老还写了一封信缅怀之。记得童老写的《新建筑流派》、《苏联建筑》、《日本建筑》等给我，“请齐康同志一阅”，我全文抄过。

学习

我入学是1949年，刚好赶上解放，整个过程中几乎没有断过课，教学也没有停顿。钟训正先生因为解放战争回家，回来后跟我们一班学习，在我们班上第一名，得过95分，我一般都是92分，我们班上还有一个成绩好的同学叫贝万春，那个时候的学生都是很浪漫主义的。钟训正比较犟，杨老总是批评他。我比较听杨老的话，杨老比较喜欢我。

一年级的时候在丁家桥，李汝骅老师当时休假，杨老就去丁家桥教我们素描，当时杨老很强调线条。每次杨老上班就带一些小模型在皮包里面，上课就将木头的小模型（圆的方的）摆起来，大家就围着画。当时杨先生教素描，强调短作业，和学苏联完全不一样（估计当时杨老、童老看不起苏联专家）。当时的素描作业大概一张A3纸大小。后来的设计初步也是杨老教，一个学期后就是李汝骅老师和樊明体老师教美术。

杨老改图，对我一生都有影响。杨老是蒙上改图，改完就是一幅铅笔画。至于说改革，杨老师宾大出来的，当时他的老师 Paul Philippe Cret 是巴黎美术学院毕业的，他很欣赏

杨老。杨老毕业后在他的事务所工作过一段，做过一些设计，挣点钱去欧洲游学一段时间。所以杨老学的是新古典主义。杨老回国后就结合了中国的传统，形成了中国式的新古典主义，比如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音乐台以及中央体育场设计都是这个风格的。杨老的到来，为我们建筑系的设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设计方面，杨老他们重视短作业，四个星期一个作业。一年级一开始是线条图，第二张就是渲染图。一（年级）下就是设计，当时黄兰谷帮我写字，第二学期做设计的同时也做快题，做小邮亭（一天就交图）、灯塔等作业。杨老出一个题目，15分钟让学生交卷。他非常重视快速训练，记得当时杨老受邀去沈阳做张学良夫人的别墅方案，杨老就带着小图板上火车，带到火车上去做，在火车上就做好了。这也是杨老非常重视快速作业的一个例子吧。

童老师的改图与杨老完全不一样。童老是拿着笔在原图上涂的。很多人一看到童老来了，就把自己的图藏起来。童老是天才，有次一个女学生画图画坏了，他出手帮这个女学生改作业，改成一张很漂亮的夜景。杨老对中国古典建筑是测绘过，比如天坛、古城墙等，杨老和童老两个人教的古建的兽吻是不同的，相比之下，还是杨老教得比较地道。

杨老是职业建筑师，基本上服从业主的意愿，要他做什么他就可以做什么。可以做新的形式和传统的形式。童老的作品不是太多，大部分是新建筑。刘光华改图改得好，画图蛮好。

当时我们阴影透视课是徐中老师教，讲了四个小时就讲完了。“投影几何”后来改名“投形几何”，后来就是龙希玉老师教了。

院系调整

我是1952年7月9日入党，那个时候曾被分配到同济教书。

1952年曾经一段时间要把南工的建筑系搬到同济去，当时市领导反对，说是南京也要留一个建筑系，就没有把建筑学搬过去。我就先留下来当政治辅导员。

初次草图

当时每次交设计作业，都要交最初的草图。老先生们先收回去，到最后评分的时候贴上去，对比看改动的多不多。

任务来了以后我们就找资料，然后做一个最初的设计草图交上去。是一个学期多个设计图，这个习惯是什么时候改掉了，大概是学苏联以后吧，一学期做一个工程（作业）。当时也不讲竞赛这个词，但做法还是像布扎体系似的。

雨花台设计方案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东大一批老师都在他那儿学习过，我为什么不出国呢，因为当时刚好和雨花台项目时间上重复继杨老师之后我主持雨花台烈士陵园轴线，我选择了留下来继续做雨花台的设计。雨花台做了以后，省委领导和市委领导对我的设计就有了信心。我的基本功是跟着刘老画中国住宅概述的插图和中国古典园林的插图时打下的，加上教一年级设计初步。

学生时参考资料

当时上学参考资料是蓝皮书红皮书。红皮书现在只有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有，蓝皮书清华大学也有的。还有 *Town Design* 和 *Civic Arts* 等。好像还有哈姆林的一本书——构图原理。

当时上学的时候最主要的参考资料还是高年级的作业，教室里高年级排在外面，老师在统间里将低年级排在里面，走过去，对我们非常有影响。潘谷西、戴复东的设计都很好的，当时建筑系总共也有 21 个人，是建筑系学生最少的时候，再到后面就人多了。我到现在记得戴复东和吴贻康画的草图，功底很好。

我们做学生的时候抄图并不是一个普遍现象。有几个同学一直坚持从杂志上抄图，比如钟训正老师就是如此，“文革”（期间）没有事情做，也是抄图，现代建筑和西方古典都抄。严格地讲解放初期是现代建筑。当时作业都是跟着老师走，走的都是现代建筑的路子。记得当时童老讲公共建筑，用的都是现代建筑的案例。

学习苏联

我记得正式学习苏联是从下一班黄伟康一班开始的。那个时候苏联的古典构图作业就来了，开始不用西方的 Order 样式，而是改用中国的古典构图——斗拱和柱式了。中古构作业是 1956、1957 年来的，是学习苏联的结果。

当时讲“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记得当时吴贻康从北京做科学院的竞赛，苏联专家看到我们的规划，就说你们的老师是喝咖啡做方案的，意思是我们的总图不好，所以就派我去学规划方面的知识，名义是学习俄罗斯建筑史，去清华学，当时刚好“反右运动”开始，我就在北京市规划组委员会的专家工作组。

学苏联把整个教学系统打乱了，对于教学触动很大，教学就开始改革了。

学苏联，到了 1960 年达开始反修，第一年去古巴，第二年去苏联，组织青年学生代表队，作为学生组代表，参加“世界建筑大会——师生会见会”。我当时的任务就是去宣传“九评”的书（英文和西班牙文版）。

学苏联学制的变化，学制是 4 年变 5 年，而清华是 5 年变 6 年。

1958 年“大跃进”提出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成立一、二年级等设计院，但时间不长，很快就停了。我参加刘老的外建史课程辅导，得到了一些锻炼。工程就是科学研究的主线，我们一手抓出书，一手抓实践。

学习苏联之前没有“教研组”，就是叫“建筑系”，没有一个组织构架。后来成立了工业教研组、民用教研组、规划教研组。我当时兼任规划教研组和民用教研组主任。

教学

1953 年到 1957 年教过一年级。当时张致中和我一起教，学生有郑光复、张耀增、孙钟阳等。我是一年级的助教，当时助教不许改图，就是收图、发图，看看老师怎么改，改完就收图。后来老师实在不够了，杨老就让我去土木系去上建筑学课，教建筑学。当时的助教有我、沈佩瑜、甘桢，我是整个设计教学的助教，一个礼拜有 23 节课，各个年级的。

那个时候我们系还是很出名的。南京的四大博物馆方案、北京火车站（周恩来接见郑光复）、南京长江大桥桥头堡最后由钟训正老师主持设计。我，还有钟老师，当时

负责的是桥头堡，那个时候是系里最光彩的，其他学校的老师都来学习。《教改专刊》是极“左”的反应。出杂志两期后停掉了。批判老先生的教学。“文革”期间，曾停掉建筑系，为了援外工程，只保留南工和清华两所。

高教六十条

“高教六十条”对建筑系有一些影响，肯定了教育与实践相结合，肯定文化知识分子的作用，从那时候起就开始重视教学。

同济的冯纪忠的“空间组合论”，也是在高教六十条期间提出，基本没有什么资料留下来。我当时记了冯先生的讲课记录，“文革”后我借来了当时讲课的资料，后来也不知道去哪里了。

关于梁思成

（清华大学建筑系是）1946年梁思成办的。他为人比较浪漫。“鸟笼子里面找灵感，垃圾堆里找灵感。”

当时清华讲他们的渲染是帕拉迪奥式的，我们的是维尼奥拉式的，我们就被批为“资本主义”，实际上是一样古典。

访谈二

访谈者：阳建强、江泓等

时 间：2016年

地 点：东南大学逸夫建筑馆五楼

齐 康：我跟你们讲几点。

第一点就是现在的城市不是单个的城市，是区域的城市，所以研究城市也就必须研究区域，而且这个区域和行政区划界很有关系，这一点很重要。

第二点就是城市规划，我是元老了，是1956年跟着苏联专家在北京工作了一年半。那个苏联专家的那套城市规划是学习莫斯科的，按照今天讲就是一个圈一个圈一个圈摊大饼，现在已经到了第六个圈了是吧。现在来讲，江泽民同志搞的是浦东，胡锦涛同志搞的是天津，现在又在搞京津冀，所以京津冀是中心呢，还是有一个城市依靠？这个问题需要研究一下。

城市规划里面我分成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城市化，第二个层次是城市形态，城市形态下面有城市规划，再下面有城市设计，这个问题很重要。

城市设计有四种。第一种是历史形成的城市设计，故宫、天坛、圣马可广场等；第二种是指导性的城市设计，就是它并不能实现，只能指导一下；第三种是围绕一个重大建筑而考虑的城市设计，像我们的国学馆，为了考虑到今后会不会把我们的国学馆破坏掉；第四种就是投资大、一次形成的城市设计。但是城市设计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应当以建筑为基础，而且是必须的。在古代并没有城市规划这个问题，都是匠人嘛。现在我为什么反复强调这一点呢，在常州有一条路叫延陵东路和延陵西路，延陵东路是我们做的，我们一竿子插到底，就是从城市设计一直做到建筑设计，建成了。但是园林西路呢，有城市规划，有城市设计，没有建筑设计，盖好后仍然是乱七八糟的，所以我觉得要非常强调建筑设计。

齐 康：所以这点来讲，巴黎的豪斯曼，他能够控制巴黎是个平的，它基本上是六层吧。香榭丽舍，那个凯旋门高45.2米吧，那个门洞呢里面也可以摆上一个天安门和人民英雄纪念碑，这说明人民英雄纪念碑尺度太小了，它在500米×800米的天安门广场没有起到一个主宰的作用。所以吴良镛先生也讲嘛，天安门广场哪个去啊？升旗仪式坐的地方也没有，坐在那还把你赶跑。所以我说，广场要有休息的地方，要有给人停留的地方，你像那个法国的旺道姆广场，就是比例非常好的一个广场，圣马可广场是一个人一个人把它拼接起来的，你有没有那本《拼贴城市》？

访谈者：嗯。

齐 康：所以我说做城市规划，你们应当要有东南大学的特点，杨老的晚年很少做单体设计，但他非常非常重视城市规划，因为他发现我们中国的城市太乱了，所以我现在正在写一本书——《可持续发展的理想城市》。为什么这样讲呢？我前面的一章就在写现实的城市，你比如说长安街，长安街上面就是布置一个个菩萨，长安街最宽的地方是107米，有点像跑百米赛跑，然后要是过街呢就要钻地道，所以很不适合步行的要求。有本书叫作 *The Art of Building Cities*，那是一本划时代的书，作者西特写的，他非常怀念中世纪的建筑和规划。因为中世纪的交通走过的巷子突然发现一个大教堂的一角，那是非常美的。我觉得我们现在没有很惊喜（exciting）的那种画面了。杨老、童老画的很多水彩都是那个时期的，从缝里头画的那种水彩画。所以我们来讲，要解决一个内向和外向问题。内向是什么呢？是解决步行的交通，我们今天仍然有用。比如说玄妙观，汽车进不去了，人在里头可以步行走，外面是停车场；外向是停车。所以要解决外向和内向的矛盾，圣马可广场人家要去的时候，车子只能停在远处，坐船进去游玩。所以步行和车行的问题对我们今天来讲仍然有用。

二战以后，英国已经被德国人打得够呛了，所以他就搞了很多 New Town，最有名的是 *Town and Village Design*，可惜这本书在建筑系被丢掉了。所以你们到英国去的话，应当跑英国的乡村。英国的伦敦并没有好不好看，因为长了好多笋了，不像巴黎。巴黎整个城市除了圣心教堂以外，高地上其他新开辟的那个地方，再一个凯旋门嘛，那个外面又是乱七八糟的，巴黎德方斯挂了几个帆布嘛，你们去过了吗？

访谈者：嗯。

齐 康：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城市很遗憾，南京是属于一个“可教育好的子女”，不好不坏。那个城墙后面冒出来好多好多房子，看不出这是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它唯一好的就是中华门，中华门那有一个缺点，站了好多“兵”一个时期布置上的。

访谈者：还在。

齐 康：还在？！这就是没有文化的表现。所以我说城市是要有四种人来管，第一种人就是管理城市的人，要有文化，现在我们管理城市的人缺少建筑文化，没有历史。第二种人是学者，就是我们这些人，但是说了话没用或少用。第三种人是老百姓。第四种人是开发商，开发商有的是唯利是图，但他们影响我们国家的经济。所以我们现在对城市规划要有一个整体的、全面的了解，这样子我们的城市才能办出我们东南大学建筑学特点出来。千万不要以官位来论好坏。

城市建设中，有一些官员都在做样子，做了一批江南的乡镇，做了一本的书，他们去调查了一下，再也不去做乡镇建设的规划。所以你们能不能抓住乡镇规划，两个、三个都可以，一竿子做到底。而且乡镇规划你要画出立体的图，给老百姓看，这是你的屋子，过去我就做过了。我说我们的规划事情，你说没有用呢，那也不能这样讲。但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到位，没给老百姓得到真正的实惠，然后那些管理者给老百姓一点钱，把它粉刷粉刷做个面子。

英国的乡镇它到底是有文化的，是非常美丽的，所以将来你们要到英国去一趟，去英国的有哪一个？没有？

认真调查一下。

齐 康：我到英国去的时候，我是1978年出去的。我出去的时候正好一个开车司机，一个老人，他说你们等一等，我去买点东西，今天我的孙子生日。我马上就跟边上的助手讲，我说请你去买一盒最好的巧克力。然后就送给他，这个老人高兴死了，那么好的巧克力！他说我今天带你跑Novth Werth，我们在海边转一圈。英国小啊，就像苏北那么大。所以我就想英国的城市设计是很好的，后来到了弥尔顿凯恩斯，哈罗新城是汽车跟人流分开的，弥尔顿凯恩斯又混合起来。所以车行道和步行道的关系问题，是我们规划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最起码的首先是斑马线，第二个是架天桥，再一个走地道。现在我们的架天桥不是都拆掉了许多？

访谈者：很多天桥都去掉了。

齐 康：基本上都拆掉了。所以我们城市规划没有解决很多问题，如解决快车道。所以城市规划设计院呢，也应当听我来讲讲嘛。我就讲这个道理很简单，但是很多问题没有实现。至于城市规划史，就是人与城市关系的一部史。那么现在我提出了五个东西，叫作轴、核、群、架、皮。

轴，Axis，是一个方向，你这城市往哪发展？所以我们现在的城市，市长就像刘伯承一样，往东发展！像我们的杨卫泽就是向江北发展，就是这样的。

核，就是Downtown，在国外来讲很重视Downtown的，周围有停车场，甚至于国外发展到沙漠中心，把停车摆到城市郊外，一大片的停车场，停车场是我们现实城市规划的一个矛盾焦点。再一个问题就是污染严重，雾霾天气不是很重吗？雾霾天气不是北京、天津、石家庄吗，我们南京算好的呀。常常是雾霾的天气，不是今年至明年10月份要在巴黎开全球气候大会了吗？我们讲是讲很好听，实际上我们的雾霾是相当严重的。再一个就是水污染，江南已经没有干净的水了，因为过去村镇大办厂的时候，曾把村村办工厂，那么这个工厂一办，那时给他优惠政策，现在好了，水都污染了。伦敦排污时候花了20年才把这条河搞干净。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地面的土壤污染，特别是在湖南，是更为严重了，所以那个地方就无法居住。

访谈者：湖南有的地方为什么特别严重？

齐 康：就是开发后，整个村子都搬出来了。中国现在有经济转化的时候，估计有140几个城市，经济没有转化。转得好的就转成旅游了如台儿庄。但这里头问题就是我们不能村村搞旅游。我说你们不是说要城市化，就是你们要懂得这个道理，我们有许多问题是严重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噪声问题，像我的家里在进香河路，隔了一个树丛，外面就是大马路，北京东路嘛，朝北的不行了，朝南还好。还有违章建筑，现在不是解决棚户区吗？过去好像棚户区都没有了，我们不是做五老村棚户区工作，过去做五老村，现在五老村没有了吧，拆掉了？我们那时候抓了300户：100户是东井亭，100户是五老村，100户是解放初期建设的工人住宅到今天还在做扩建工作。

当时我想得早，在“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做了那个表，每家每户有几